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余西云 著

JIANGHAN DIQU
WENHUA BIANQIAN

湖北
外
语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武汉大学文科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余西云 著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 余西云著. — 北京: 商务印
书馆, 2017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14437-7

I. ①江… II. ①余… III. ①文物—考古—湖北—文
集 IV. ①K872.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47449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余西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4437 - 7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4

定价：72.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心。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2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年2月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的学科。考古学研究的遗存，应该具备情境属性，情境的核心就是时间上的联系和空间上的联系。那些没有明确出土遗址和层位的流散文物，就基本上不具备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大致属于金石学研究的范畴。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从具体层面上说是遗存，从抽象层面来说就是文化，文化研究是考古学更本质的特征。考古学研究就是从遗存出发，通过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达成文化研究。

考古学的文化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文化内涵的揭示，具有共时性的特点；一个是文化历史的复原，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文化历史研究，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对一批遗存，特别是遗物，进行排队、分期；对一个地区进行文化编年，建立文化序列；对文化进行谱系研究。以上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三个主要阶段。遗存分期揭示的是特定遗址或者特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序列揭示的是特定区域文化的静态变化过程；文化谱系揭示的是广泛区域内文化的动态变迁过程。在文化序列的基础上，分析文化的源流，是文化区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化因素分析，主要揭示考古学文化尺度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文化谱系研究，则是在文化期的尺度上，揭示不同文化或者同

2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一文化内部不同区块（空间类型）之间的互动，揭示文化生成、变异、扩张、收缩、瓦解或消亡的过程。遗存的排队、分期，是文化历史的基础，区域文化序列是文化历史的骨架，文化谱系是文化历史的血肉，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文化序列是相对有限的，而文化谱系是绝对无限的。文化历史会在谱系研究中不断深化，不断丰富。

文化是一个复杂整体，但其内涵可以分为不同部分或者不同层面，比较合理的是将文化分为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意识层面。技术层面包括生业、制作石器、制陶、治玉、冶金等诸多内容；社会组织层面主要包括亲族组织和政治组织两部分；意识层面包括文字、艺术、宗教等诸多内容。这三个层面是联系的、互动的，把考古遗存分为技术遗存（technofacts）、社会遗存（sociofacts）和意识遗存（ideofacts）三部分，并不合适，因为具体的遗存既可能反映了人类的意识，也可能同时包含有技术的和社会的信息。将这三个层面联系起来，就会形成链式的研究。如陶器的形制研究，首先从同一器类的形态差别分析制陶技术之间的差异，陶器形态以及制陶技术的区别，反映的可能就是人群的不同，就是组织层面的内容，由此可以达到文化谱系的研究。石器的“操作链”研究，既涉及选取石料、加工石器等具体的技术层面；不同技术类型也可能反映不同的人群，这就涉及组织层面；不同的操作模式，也可能反映操作者或者所在社会的认知情况等，这就涉及意识层面。青铜器首先是技术的产物，但如果从找矿、采矿、选矿、冶炼、铸造、运输、交换、分配、赏赐、馈赠、使用、废弃和埋藏等进行链式研究，就会从技术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和意识层面。新石器化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分别侧重生业类型和政治组织，但其实也是一种链式的研究。

现在的考古学主要还是在实物遗存的层面建构历史，将来的考古学应该会更多地从文化内涵的层面建构历史。

目录

Contents

第一编 文化谱系

长江中游及周边地区几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谱系与年代	3
从庹家洲看老官台文化动态变迁过程	30
楠木园文化及相关诸问题	41
从朱家台看“大溪文化”	48
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遗存试析	53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陶鼎研究	65
三元宫遗址的分期及其文化性质	86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	94
盘龙城遗址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	110
江汉地区两周时期陶鬲谱系研究	128
三峡库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变迁	164
三峡考古重建的巴史	197
巴人历史年表	203
丹江库区的文化变迁	206

第二编 文化结构

欧亚大陆新石器化研究动态	211
--------------------	-----

2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马岭：穿越古代社会看姓族	229
两分结构聚落反映的亲族组织	232
西山城的情境分析	245
西阴时代：中国文明的滥觞	257
从群落到帝国	
——三峡古代社会发展阶段性的考察	267

第三编 方法理论

遗存的分类与形式	285
情境与情境方法	291
马岭：聚落考古的探索	297
考古学文化与类型学	308
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演进	310
文化谱系论及其意义	314
能动性：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	317
作者著述列表	323
后记	328

第一编

文化谱系

长江中游及周边地区几类新石器时代 早期遗存的谱系与年代

长江中游及周边地区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是探讨华南地区新石器化的重要资料。关于这些遗存的年代与谱系，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我们从楠木园文化探源的角度出发，对几类典型遗存进行分析，试图对长江中游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年代与谱系做一番梳理。

一、楠木园文化

楠木园文化根据巴东楠木园遗址命名，是近年在三峡地区发现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①。同类遗存还见于丰都玉溪遗址^②。

楠木园文化陶质主要为夹砂陶。粗泥质陶也占一定比例。仅有少量泥质陶和夹炭陶。陶色以红褐色为基调。陶器表面装饰主要为绳纹，有少量花边、划纹（网格状）和素面（抹光）。主要器类有釜、支座、罐、钵、碗和壶等，另有少量勺、匙、器盖、杯等。楠木园文

^①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余西云主编：《巴东楠木园》，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邹后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载《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化的陶器几乎全为手制，仅有个别陶器可能经过轮修。最主要的制法为泥片贴塑。

楠木园文化石器数量相当多。石器多以砾石为原料。石器绝大部分仅经过打制，石器的主要剥片方法是锐棱砸击法，其次为锤击法。打制形成的石核、石片经过简单修理或不再修理即大量使用。这些石核工具、经过简单修理的石片工具和未经修理的使用石片占到全部石器的六成五左右。成型石器很少，只占石器总数的 15% 左右，一般经过琢制，有的再经过磨制。磨制石器的比例低是楠木园文化石器的一个特色。磨制石器只占石器总数的 6.8%。磨制石器中绝大多数又只磨刃部。通体磨光的石器仅占石器总数的 1% 左右。

根据文化面貌的变化和层位关系，发掘报告把楠木园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年代大致为 5500B.C.—4500B.C.，早期与晚期之交在 5100B.C. 左右。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与城背溪遗址 H1 等遗存有可比之处。楠木园文化晚期遗存与以朝天嘴遗址 G6、G7 为代表的柳林溪文化遗存多有可比之处。

关于楠木园文化的来源，发掘报告在讨论楠木园文化的性质时，提出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包含有城背溪文化的因素和李家村类型因素。本文主要探讨楠木园文化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这支源头。

二、城背溪文化

城背溪文化根据宜都城背溪遗址命名^①，但城背溪遗址发掘报告对城背溪文化内涵的界定比较含混。发掘报告将城背溪遗址的“城背溪文化”遗存，根据南北两个发掘区的“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遗物特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点”，分为五部分，认为南区遗存可分为上、下两层，实际就是前、后两期。而 T6 和 T7 第③层遗存则包含了前、后两期。北区 T10 ③这个“夏商周时期”的地层包含的城背溪文化陶器与南区上层陶器接近。

检索发掘报告的内涵，总的来说，各组遗存多有含混之处。根据釜、支座及其他器物组合等情况，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从早期到晚期的五组：

I 组 以城背溪南区 T6 ③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其中的釜为深腹，溜肩，卷沿较大，沿腹交界不明显，一般为重叠沿，从唇到底满饰绳纹。支座底部较大，头大幅度前倾。有特色的组合器类有双耳扁腹壶、镂孔圈足盘等。

II 组 以城背溪 H1 等“南区下层”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其中釜的腹较深，溜肩，卷沿较小，沿腹交界比较明显，一般为重叠沿，从唇到底往往满饰绳纹，也有个别器物口沿部位不饰绳纹。支座底部较大，头大幅度前倾。有特色的组合器类有双耳折腹壶、圈足盘等。

III 组 以城背溪“南区上层”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包括城背溪北区 T10 ③中的“城背溪文化”遗存。其中釜的腹较圆，肩较鼓，卷沿或重叠卷沿外侈，沿腹交界处有明显束颈痕迹，从唇到底往往满饰绳纹。

IV 组 以城背溪南区 T7 ③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其中釜的腹较圆，肩较鼓，折沿略外侈，从唇到底往往满饰绳纹。

V 组 以城背溪南区 T5 ③：1 釜（报告称为“瓮”）等为代表的遗存。T5 ③：1 釜，腹较圆，肩较鼓，折沿，腹部饰绳纹，口沿外一般不饰绳纹。

另外，《宜都城背溪》发掘报告还发表了金子山、栗树窝、枝城北、青龙山、孙家河、花庙堤等遗址“城背溪文化”的内涵。

金子山位于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为一个近圆形的小山丘，山坡较陡，文化层“往往有冲积现象”，估计是次生堆积。金子山的“城背溪文化”遗存，也包含了不同时期的遗存，其中的釜类可以做

6 江汉地区文化变迁

如下排序：

I T4②：14，溜肩，卷沿较大，沿腹交界不明显，一般为重叠沿，满饰绳纹。接近城背溪I组的同类器。

II T3③：11，腹较圆，肩较鼓，卷沿外侈，从唇到底往往满饰绳纹。或接近以城背溪“南区上层”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

III H1：12，腹较圆，肩较鼓，折沿，腹部饰绳纹，口沿外一般不饰绳纹。接近以城背溪南区T5③：1釜等为代表的遗存。

IV T3③：17，圆鼓腹，素面。应该已经进入了大溪文化的范畴。

另外，T3③：4这类“罐”可能更晚一些，或可晚至春秋时期。

综上分析，《宜都城背溪》报告中的“城背溪文化”遗存可做如下分组：

第一组：以枝城北H1为代表的遗存。

第二组：以城背溪南区T6③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包括金子山I组。

第三组：以城背溪H1等“南区下层”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

第四组：以城背溪“南区上层”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包括城背溪北区T10③中的“城背溪文化”遗存。略晚一点的有金子山II组。

第五组：以城背溪南区T7③主体部分为代表的遗存。还有青龙山第④层、H2，栗树窝T1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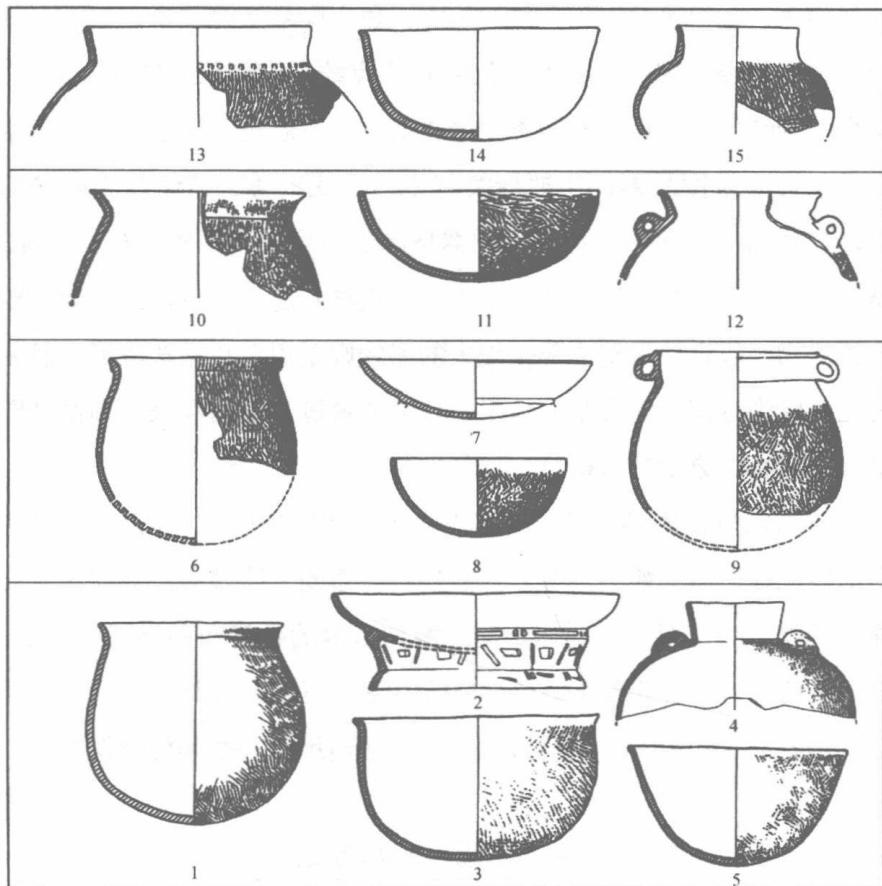
第六组：以城背溪南区T5③：1釜（报告称为“瓮”）等为代表的遗存。包括金子山III组，青龙山第③层、H1。

第七组：孙家河T5③等。

第八组：金子山IV组，孙家河采：041等。

其中第二、三、四、五组的文化面貌接近，可作为城背溪文化的典型遗存（图一）。以枝城北H1为代表的第一组遗存与城背溪文化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后文将做进一步的讨论。第六、七组也与上述城背溪文化遗存有一定差别，大体进入了一般所谓的“柳林溪文

化”或“关庙山一期文化”的范畴。至于第八组，则属于典型的大溪文化遗存。



图一 城背溪文化的分期

1. 釜 (T6 ③: 67)
2. 圈足盘 (T6 ③: 23)
3. 盆 (T6 ③: 14)
4. 双耳壶 (T6 ③: 73)
5. 钵 (T6 ③: 6)
6. 釜 (H1 ①: 2)
7. 圈足盘 (H1 ②: 12)
8. 钵 (H1 ②: 8)
9. 双耳罐 (H1 ②: 4)
10. 釜 (T10 ③: 32)
11. 钵 (T10 ③: 2)
12. 双耳罐 (T10 ③: 8)
13. 釜 (T7 ③: 57)
14. 钵 (T7 ③: 11)
15. 罐 (T7 ③: 47) (标本均出自城背溪遗址)

其他进行过发掘的城背溪文化遗址还有宜昌路家河^①。

城背溪文化陶器的陶质以夹炭陶为主，往往含有大量的碳化物，

^①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